

从国务总理到社会慈善家

——熊希龄的人生轨迹

□ 李秀潭

多年前，偶然从一位湖南古玩商处收到一枚熊希龄名章。这枚名章，寿山石质，粟黄色。印纽仿汉代护符翁仲形，采用圆雕写实手法，沉雄中蕴古朴，秀劲中见刀趣，形象古拙，韵味独出，颇具“汉八刀”风骨。

熊希龄，早年参加维新变法，民初担任国务总理，晚年投身社会慈善，创办驰名中外的香山慈幼院，成为著名的爱国教育慈善事业家。但长期以来，这样一位近代中国的重要历史人物，却受到史学界的冷落。

维新志士

熊希龄出生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在这块荒凉、闭塞、贫瘠并且屡遭劫难的土地上，自近代以来，竟然相继涌现出许多神奇的风云人物。著名画家黄永玉是熊家的姑表亲，文学家沈从文是熊家的姨表亲。熊自幼禀赋聪颖，勤奋好学，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入词馆，少年及第，成为湘西穷乡僻壤的才子。

人的成长，其思想的发展变化，往往与其生长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关系。近代湖南是湘军的故乡。熊希龄在青少年求学时代，就十分崇敬开启风气之先、办过洋务的乡贤魏源、郭嵩焘、曾国藩、左宗棠、曾纪泽等人，树立起经国济世的抱负，立志去干一番大事业。

1894年，中日战争事起，熊请求上前线赴敌，往投湖北军营，被湖广总督委充两湖营务处总办。1896年，由湖北返湘，襄助湘抚陈宝箴行新政，筹办湖南时务学堂，主持《湘报》报馆事务。《湘报》是湖南最早的近代报纸。其宗旨是“专以开风气，拓见闻为主”。对湖南维新人才的蔚起有前驱先路和启迪之功，使湖南成为当时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为此遭到本省守旧势力和部分士绅的反对、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警告和北京湘籍官员的弹劾。而熊希龄的态度是：“龄本草人，生性最憨，不能口舌与争，惟有以性命从事，杀身成仁何不可为？”由是观之，熊在湖南维新运动中表现出的献身精神，并不亚于“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1898年，戊戌政变前，清廷电传熊“迅速来京，预备召见”。后熊因病推迟北上，政变中六君子罹难，他幸免一死。朝廷降旨，以“庇护奸党、暗通消息”罪，处以革职，永不叙用。后因他改革创新體陵瓷业、振兴湘省实业有功，经湘抚赵尔巽上奏清廷，解除处分，开复原官。

1905年，湘抚端方奉命与载泽、戴念慈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为将来立宪作准备。端方保荐他为随员，熊希龄由此重新踏入政治旅途。

翊赞共和

1911年10月10日，辛亥武昌起义爆发。熊希龄囿于随五大臣出洋考察君主立宪思想的束缚，他还是忠于清廷和坚持立宪立场的。那时他甚至做好了要为朝廷死事的思想准备。但是不久，全国各省纷纷响应，清王朝土崩瓦解。他亲眼目睹了那些体现朝廷威仪的王公大臣惊慌出逃的丑态。他对这个王朝失望了。在中国转折的历史关头，熊希龄认识到只有识时务、顺民心，才是全大节

的爱国义举。由是，熊毅然从坚持君主立宪转向拥戴共和。

1911年12月1日，熊希龄离开对他有知遇之恩的清廷重臣、东三省封疆大吏赵尔巽，到达上海，与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党人会见，表明积极维护共和大局的政治态度。同时积极参加上海共和建设会活动，并邀集湖南人士组织湖南共和协会，为共和建设诸事多方奔走，竭尽心力。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国内尚处于南北分立状态。熊希龄以“非南北一致，不足以存国”为虑，又积极地做南北统一的促进工作。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归国抵沪，与革命党人商议统一建国诸要端，急于制定一个统一全国的财政计划与实施纲要。熊希龄作为晚清理财大家，根据东三省理财的实践经验，深知财政与政权、与国计民生的重大关系。在孙中山、黄兴恳求下，熊为南方革命党人草订了治理全国财政的蓝图。因此在南京临时政府组建时，黄兴提议由熊担任财政总长。而孙中山认为熊属立宪派人士，便以“财政不能授他派人”为由表示反对。后来给他挂了个“南京临时政府顾问”的头衔。

民初政局，诡谲多变。在多方政治势力角逐博弈中，孙中山于1912年2月13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参议院2月15日选举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对于在清末官场享有“理财能手”的熊希龄加以重用，重新把他推向财政总长的位置。中国财政在晚清时代濒临破产，民国成立后，财政上只有支出，并无收入。为了解决危在旦夕的民国财政，他向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借款一千二百余万两，由此招致舆论哗然，国人反对。加之内阁总理唐绍仪与总统袁世凯关系破裂，唐愤而辞职，熊作为内阁成员，与其他阁员联袂求退。袁世凯认为熊“与普通官僚不同，有傻干精神，尚可利用”，便请他当总统府顾问，并单独设一财政委员会，让熊任会长，专门用以“谋救财政困难及筹借外债事件”。1912年10月上旬，熊办成与英国克利甫公司大借款后，再次向袁告辞。袁为了不让熊离开自己，便于对他进行掌控，决定暂时将他外放为热河都统。

热河都统系文职，主要职责乃是经营边防军事，平定匪患和维护热河地方治安。热河又是前清皇帝行宫，这里陈设存放着许多清宫故物。每位都统到任，都要将宫内陈设存放各物清查一次，借机私取若干古玩，早已视为“定例”。熊对于古玩毫无雅兴。看守者屡以为言，熊认为如不收取物件，看守者必不安心，因亦收取若干件。没想到后来成为袁世凯对他进行挟制利用的“把柄”。

大醇小疵

熊希龄在热河任事期间，国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要人宋教仁在上海车站遇刺，涉及现任国务总理赵秉钧和总统袁世凯。国民党与袁剑拔弩张，于是发生“二次革命”。熊不希望国家分裂，故对革命党人有所指摘，与刚成立的进步党主张一致，站在袁政府一边。因此，熊作为进步党的“名誉理事”，居然获得了组阁机遇。面对民初波诡云谲的政治局势，熊甚为惶悚，不愿就职。但袁世凯利用熊在热河行宫私拿文物一事做起文章，熊不得不“应允就职”。

太阳照耀在巴克特里亚

玄奘经过了胡人的粟特地区，从铁尔梅兹渡河去了阿富汗，找到了西突厥王庭的首领——和中国高昌有着亲缘关系的结盟国，再沿着阿姆河穿越阿富汗后到达印度。这里的居民和周边更广大的区域在古代阿契美尼德被称为“巴克特里亚”，古代的巴克特里亚的人物形象，曾经出现在波斯波利斯的浮雕上，也出现在亚历山大东征粟特的史诗故事中。

公元前5世纪左右开始，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开始出现小群落，公元前250年左右希腊人在此建立殖民地，为守住阿姆河渡口，沿着阿姆河兴建要塞建筑，后逐渐扩展为城市。公元前129年，张骞历经苦难到达此地。称此地为“大夏”，在后来汉文献中该地区被记载成“吐火罗”等音译地名。

但历史留给这里的，除了大片的废墟遗址、军事禁区，主要还是一直兴盛的绿洲城镇文化和沉睡在地下的古代文明。对于近代研究学者来说，中亚地区关于佛教存在和传播的证据一直模糊，因为该地区已经完全伊斯

兰化，除了伊斯兰文明外，当时没有什么佛教的考古学发现物。最早被认为是佛教遗物的反而是撒马尔罕的粟特壁画。这种对于过去宗教文化未知的状态一直持续到1926年，当邻国阿富汗的历史面貌在大量考古发现下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犍陀罗美术史学者富歇等人正在巴尔赫努力寻找希腊化佛教遗址的消息也传到了苏联。

一河之隔的阿富汗正在文化建设中迈出坚实的步伐，苏联也立刻行动起来，莫斯科国立东方美术馆组织了一个大考察团，综合了各个专业的人才，决定调查靠近阿富汗的乌兹别克南部、阿姆河右岸的铁尔梅兹地区，也希望发现类似的希腊化佛教遗址。

后来经考古学调查证明，这个佛塔建在长方形基坛（长22米、宽16米）上，塔身为圆形，直径约为14.5米，高约13米，采用当地的日干黏土砖材料进行构建。大概建于1—2世纪贵霜王朝的迦腻色迦王时期，属于比较古老的样式。

1928年，考察团又在铁尔梅兹古城的西北角卡拉拉地发现了被黄沙掩埋的石窟，这些不规则的石窟建筑是



熊内阁组成后，颇思有所作为。他的大政方针是：在政治上贯彻资产阶级民主法治精神，建立“一真正共和国”；在经济上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将中华民国尽快纳入现代化建设轨道。但这些都触犯了袁世凯蓄谋推行的封建军阀专制统治和扩张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意图。因此处处受到掣肘，难以施行。特别狠毒的是，沉毅狡悍的袁世凯再次利用“热河行宫盗宝案”作为王牌打出，挟制熊内阁为他解散国民党和国会背书，为自己攫取更大权力扫除障碍。熊迫于袁的威慑，只好听命袁的摆布。国会解散后，熊内阁已没有多大利用价值，袁于是再次使用热河行宫文物案这个“绝招”，逼熊辞职下台。

出任国务总理，是熊希龄从政旅程上的巅峰，同时也是他一生中最为人们指责的瑕疵。熊希龄欲图施展自己的理想抱负，却始终遭到袁的钳制；他“虽明知项城权诈”，却又不得不“百端迁就，冀其统一环区，存此社稷”，以至于最终被袁利用，为世人所诟病。这反映了他政治上的软弱，是他一生最大的悲剧。民初的政局和时势既然造就了专横独断的一代枭雄袁世凯，也就注定了欲图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方案的熊希龄，在政治上只能是个失败者。

笃志慈善

熊希龄辞去国务总理后，深感在袁世凯的暴政统治下不能有为，对政治渐生恶感，从此“不与闻政治，专以实业韬晦”。1915年秋，袁世凯野心勃勃地欲登皇帝宝座。为了不卷入帝制复辟的漩涡，熊急流勇退，当即离开北京回湖南老家省亲。袁世凯帝制败灭后，黎元洪继位大总统，任命段祺瑞组阁，想请熊入阁，均被他婉言谢绝。因他自涉足宦海以来，几度沉浮，历经炎凉，又曾被袁世凯挟制利用，人们不明真相，对他诸多误解，追悔莫及。因此从1916年6月始，他便完全脱离官场，在天津奉母终养。

熊希龄退出政坛之后，曾试图以“隐居”方式逃避现实，可是他“凡心”未了。1917年夏末秋初，河北境内遭遇50年来未有之洪涝灾害，几百万灾民需要救援。出于以救人济世为己任的中国传统美德，以及把救灾当作对自己过去的政治过失进行“赎罪”的心理，熊希龄出面主持京畿一带的赈灾事宜。从这次顺直救灾开始，熊开始确立了为社会慈善事业奋斗终生的意愿。

长期的救灾办赈，使熊希龄感到有必要建立永久性的慈善救济机构。1922年10月在北京成立世界红卍字会。“世界”意为普及全球，“红色”取其赤子之心，“卍字”则

取其四围上下无不圆通。从该组织成立始，直到1937年12月他去世，他连任三届该会会长达12年之久，以此作为自己服务社会、从事全国各地（包括境外）慈善救济的阵地。从事的永久慈善事业包括：专收贫民子弟的小学、中学；为穷人看病的医院；收养因病残废的残废院；专收灾区平民贫儿的平民工厂、贫儿习艺所；用来扶助小本营生贫民的贫济所；专收无力抚养婴儿的育婴堂、孤儿院；救济无力生活逃荒流民的粥厂等。

熊希龄不仅致力慈善救济，而且创办慈善教育。在当时的社会和教育界影响最大的就是开办香山慈幼院。该院专为收养孤儿童所设立。尤其眼光的是，该院采用欧美国家最先进的家庭教养方式，推行学校与家庭、社会“三合一”的教育体制。

熊希龄在创办慈善教育的同时，还在全国发展、普及、推广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他夫人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董事长，晏阳初任干事长。该会总会事务所设在他家里。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陶行知、晏阳初办的乡村教育、平民教育，其中也包含有熊希龄的一份功绩。

最难能可贵的是，在抗日救亡的历史关头，熊希龄将慈善事业、慈善教育与民族危亡紧紧联系在一起。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与黄炎培等知名人士发起组织中华民国难救济会，致电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等将领，吁请坚持抗日，共赴国难，护我疆土。表示凡殉难将士之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子女无力赡养者，均设法照料。为了表明自己奔赴国难，矢志于社会慈善之决心，他还在香山熊家墓园为自己筑了生圻，表示一旦在抗日救亡中倒下，即埋葬在这里。并将自己所有家产，包括公债票、股票、房地契等动产和不动产，全部捐献给社会慈善事业。捐产后，熊便以孑然之身，全力以赴地投入抗日救亡之中，直至为香山慈幼院孤儿南迁长沙，绕道香港时，因刺激太深、旅途劳顿，不幸突发脑溢血，猝然逝世。

中国近代著名状元实业家张謇曾云：“天生之人也，与草木无异。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熊希龄一生蒿目时艰，尽瘁国事，关怀民瘼；晚年宦海倦游，绝意仕途。退出政界后，披肝沥胆，殚心尽力，舍生忘死，笃志于社会慈善事业。较之那些沽名钓誉的政客、利欲熏心的市侩，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熊希龄没有理由不被后人尊敬。

未已斋札记

下了一些调查线索。二战结束后，该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和遗址分布已经基本明了，一些地下的佛教遗迹分布已经确认。二战后，马森的儿子继承父志，继续调查埃尔特塔姆，1964年在周边地区陆续发现一些小型塔形建筑，初步揭示了佛塔的属性。埃尔特塔姆佛塔的柱头上有叶子、人与动物的装饰，与巴基斯坦犍陀罗的柱头装饰类似。这些柱头原本的功能应该是被安置在佛寺入口的柱廊和侧壁上方作为装饰，人们进入寺院时仰视这些事物，这似乎让人联想到天籁之音和美好世界。可以推想，当初希腊人的后裔散落在这个地区，他们思念着地中海湿润的故乡，一直延续着某种寄托和怀想。

洪水冲出的希腊化佛教遗址

到了1932年，中亚佛教研究中出现了更重要的考古成果：在铁尔梅兹上游18千米的埃尔特塔姆古代遗址被发现。当时在塔什干大学任教的考古学家马森见到照片后，开始发力研究，认为这是属于希腊式佛教——犍陀罗文化系统的文物，年代应该也是犍陀罗时期2世纪左右。之后马森开始带领小型的考古调查团进入该地区，对埃尔特塔姆的佛教遗物进行调查。不断探查作业之后又陆续发现8个类似的雕刻，这些融合希腊和中亚风格的新发现给人们揭示出一个在该地区和巴基斯坦犍陀罗文明类似的文明。

在20世纪初期，铁尔梅兹的发现震动了世界，民族学、人类学、建筑学和考古学各专家学者跨学科展开联合调查。629年玄奘探访铁尔梅兹的记录，给该地区的佛教遗址调查留

己的文字，也没有超越希腊文化的科技和生活方式，在维持自己在该地区的统治中有了新的文化认同。这些希腊语在后期逐渐发展变化，有些演变为巴克特里亚语，仍沿用希腊文习惯从左往右记述，从公元1世纪至今，这种语言一直作为该地区的行政语言存在于阿富汗北部和中部地区。

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吐火罗国故地国家的通用语言为：“语言去就，稍异诸国；字源二十五言，转而相生，用之备物。书以横读，自左向右，文记渐多，逾广率利。”玄奘所记述的“字源二十五言”，是此地通常所见的希腊二十四字母，后来根据需要使用，加上一个具有sh音值的特别字母，共二十五个字母。该语言通用于阿富汗境内很多国家，玄奘同样记载为“文字大同貌货逻国、习俗语言，风教颇异”。近代出土了一些写本资料也印证了玄奘的记载，说明玄奘当时观察的准确，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希腊人后裔已经部分改宗佛教。

环球史话

跨区监察的历史经验

□ 张晖

在国家行政机关之外设立单独的国家监察机关，这是中国政治中的传统。历朝历代不仅在中央层面设立了御史府、御史台、都察院、监察院等专职监察机构，而且向地方派驻了监察官员。例如汉朝划分全国为十三州，各州派驻刺史，巡察郡县官吏；唐朝划分全国为十道，各道派驻采访使，监督州县官吏；宋朝划分全国为十五路，各路设安抚使、转运使、提点刑狱，分别在军政、财政、司法方面监督州县官员；元朝设立江南、陕西两大行御史台，以及二十二道肃政廉访使，纠察地方吏治；明朝以中央都察院名义，向各省派驻总督、巡抚与巡按，考察地方官员，监管地方事务；南京国民政府划分全国为十六个监察区，派驻监察委员行署，代表监察院行使选举、弹劾等项权力，震慑各省不法官员。无论州、道、路，还是行台、行署，都是另设的监察区，与当时的行政区并不重合。

监察区与行政区分开，或者监察机关跨行政区管辖，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一、监察官员可以保持相对独立的身份，免受地方行政官员牵制、干扰，可以更加有效地行使职权。历代监察官行政级别往往低于同时期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却能凌驾于后者之上，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二、监察官员不必受行政事务羁绊，避免变成新的行政官员而丧失原有的监察职权。汉代刺史、唐代采访使、明代巡抚辖区逐渐与行政区混同，职权也与地方行政长官无异，就是很好的例证。三、监察机构精简、人员精干，有利于节省国家的人力、财力、物力，同时发挥更大的监察效能。历代监察机构、官员数量都要远少于行政机构、官员数量，就是出于这种考虑。四、监察区与行政区分离，造成地方层面权力多元化、分散化，有利于维护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宋朝以后中央权威越来越高，地方割据局面很少出现，这与地方分权制度是分不开的。

监察区与行政区分开，或者监察机关跨行政区管辖，也有一些害处：一、机构叠床架屋，官员相互牵制，公文繁复往返，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行政效能；二、监察系统处于行政系统外部，两者互不关联，如果上下级行政官员串通舞弊，监察官员掌握的信息和资源相对有限，难以有效地发挥监督作用。不过，这些害处在通常情况下是可以通通过制度设计进行抑制和规避的，所以历代政权在统治稳固、社会安定时期，往往都能坚持监察区与行政区分开的制度；而在统治衰落、局势动荡时期，不得不放弃这一制度，转而加强行政效能，作为救急措施。总的来说，监察机关跨行政区划管辖还是利大于弊。

阅读中亚的过去

沿着玄奘的足迹

□ 邵学成